

共建“一带一路”·理论与实践

“一带一路”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 刘尚希

“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各类黑天鹅事件频发,让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如何从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找确定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新动能?在过去的近6年里,“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愿景转化为现实行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载体和途径,为经济全球化找到了新的确定性。

人类的文明史是从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的进化史。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类的创造性和“忧患意识”构建起来的公共风险理性。然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中,全球治理规则出现了不适应,导致全球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风险日渐全球化,进而演变为全球公共风险。

一方面,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日趋丰富,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细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金融链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紧密地联系,世界各国日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无论是金融、投资、贸易、能源、气候等领域的全球协调及其规则,还是整个全球治理框架都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世界发展的需要。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数字化技术以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全球治

“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 合作理念创新,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找到了新方向
- 合作机制创新,为世界各国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合作创造了机会
- 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为世界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致力于探索构建一种基于互联互通的新型全球化。经过近6年的实践,“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合作新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新力量,给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一是合作理念创新,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找到了新方向,降低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有什么样的行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理念。自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以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贸易带动了投资,形成了全球分工和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但贸易合作的理念是单一维度的,仅仅依靠自发的市场竞争力量,容易产生明显的全球“马太效应”,带来全球的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世界不确定性之所以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一带一路”建设超越了贸易竞争,更聚焦于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交通运输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合作比单纯的贸易合作更能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能和发挥各国资源禀赋优势,更有利于创业和就业,实现包容性发展。这有利于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基础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高度契合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期盼。正因如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经过近6年的探索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但我们也应看到,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仍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各参与国必须加快“补短板”,着力推动多边合作机制的完善以及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步伐,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大的确定性。

一是着力完善多边合作的长效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由于各国在法律体系、宗教信仰、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以及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理论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差距,相关政策协调、沟通、对接的成本较高,国际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参与方预期的不稳定性仍较大。这需要“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加强对话协商,尽快建立一整套清晰、稳定、透明的合作体制机制,实现各国政府在战略意图、落实能力、行为预期、利益诉求等方面的衔接契合和兼容互补。具体来讲,应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加大对常态化沟通机制、战略规划

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是不确定性

- 传统的全球治理规则和理念面临新挑战,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已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 中国遵循既有国际规则,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政策协调,为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最大的确定性

理规则和理念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共同行动起来应对。可有的国家反其道而行之,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世界的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已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人类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我们拥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能力。中国传统哲学

中的“和而不同”的整体观为我们从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确定性提供了启示,并认识到,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遵循既有国际规则,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政策协调,这些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左右,为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最大的确定性。

将其经济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实现资源的有效对接和高效利用。

三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已经为世界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除了全球经济失衡以外,还与各国联通障碍紧密相关,更与全球治理规则跟不上全球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直接相连。近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着力点,更加注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更加注重构建公正合理的战略架构,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面合作新架构和共享发展机遇的新平台。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由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区域,涉及经贸、金融、文化、信息、科技、能源等领域的深度合作。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速3.7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7.4%。据世界银行测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4.1%,将使“发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2.6%至3.9%。“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显然,共建“一带一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顺应了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也让参与各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进一步增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认同感和参与度。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的增多,各参与国逐步结成了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有机整体,通过统筹协调和共同行动,为防范化解全球公共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

- 着力完善多边合作的长效机制
- 着力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协同机制、经贸交流合作机制、投融资机制以及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力度,确保各项机制同步推进、均衡发展。在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应尽可能明确界定权利和责任,并实施奖惩并举、激励相容的运行保障措施。

二是着力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借助社会资本力量,弥补政府的投入不足,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选择,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动能。基础设施兼具商业性和公共性,其收益的外溢性很强。基础设施对当地居民而言,公共性更突出,而对国际投资者而言,又是商业投资项目。因此,如何协调基础设施的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的矛盾,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重点考

虑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如何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我认为,可积极运用国际上已经广泛运用的PPP模式,并可将其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建设的首选。具体来说,一是要针对各国具体情况,不断创新完善PPP模式,推动各国政府与市场资源的创新融合,在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同时,切实保障项目投资方的合法权益;二是要推动各国PPP市场的对等开放,在法律、财税、金融、标准以及流程等方面为推广运用PPP模式创造条件。

今天,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正逐步迈向以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必将给这个时代带来更多的确定性,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经济漫谈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多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不久前,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即将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强调“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决心和信心。新起点,新征程。探源开放理论,深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有利于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新时代的对外开放,从而不仅为国内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也为世界带来更大机遇,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一)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

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泉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很多。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2000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20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

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多年所实现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

料和新组织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主体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由于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的,所以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

□ 张宇燕

(二)

总的来看,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加强→创新和习带来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作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乃大势所趋。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实践。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验证。展望未来,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探源开放理论逻辑 理解互利共赢战略